

封鎖線下的進出口貿易： 重探清法戰爭對臺灣之影響

黃寶雯*

摘要

在 1884 年至 1885 年的清法戰爭中，法艦一度對臺灣拉起了一條封鎖線。透過茶商陶德（John Dodd）在 *Journal of a Blockaded Resident in North Formosa during the Franco-Chinese War, 1884-5* 一書的描述，這條封鎖線大致給予人臺灣商品外銷受挫的印象。然而事實上，這條封鎖線實存期間不過半年，由淡水海關的報告及統計數據中，可以看到 1883 年至 1885 年間，淡水海關的進出口關稅總額不降反升，甚至在 1885 年達到自淡水開港以來的高點。這些現象透露出法艦封鎖對臺灣造成的影響，其實與過往我們的印象有著一段巨大的落差。本文試圖從淡水海關的紀錄出發，重新探討清法戰爭間法艦的封鎖對臺灣所造成之影響，以及封鎖線為何有印象與實際情形的落差，而這種落差又是如何形成的。

關鍵詞：陶德、封鎖線、清法戰爭、淡水海關、關稅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

一、前言

1884 年至 1885 年，臺灣被捲入清法戰爭的戰火之中，當時人在淡水的英國商人陶德（John Dodd, 1838-1907），將其見聞與感受記錄成冊，並於 1888 年出版為 *Journal of a Blockaded Resident in North Formosa during the Franco-Chinese War, 1884-5*。陶德的筆下現出的戰爭悲慘景象：砲擊、生命及財產備受威脅的外國人、稀缺的物資、對外訊息的阻隔，以及商貿的斷絕；也是我們一般對清法戰爭期間臺灣的印象。

然而，淡水海關稅務司（Commissioner of Customs）法來格（Edmond Faragó）筆下的淡水，卻與陶德筆下的淡水有些許出入。由稅務司編寫的海關報告雖然主要關注進出口貿易的相關數據，但除了貿易數據外，舉凡政治、社會等等面向無所不包。¹在法來格所編寫的〈1884 年淡水海關貿易報告〉及〈1885 年淡水海關貿易報告〉中，即描寫了清法戰爭時臺灣的情景。²

淡水海關報告雖然記錄了法來格對戰爭的憂心，但亦能看到大稻埕商貿是多麼朝氣蓬勃，這種看似矛盾的情景，在報告中表露無遺。法來格在〈1884 年淡水海關貿易報告〉的開頭寫道：

在檢視 1884 年淡水的貿易時，請一定要銘記在心，實際貿易期間並非全年 12 個月。1 月到 10 月中，貿易仍能順利進行，但從 10 月中以後到年底，淡水港便遭到封鎖，貿易船隻無法進入港內。³

¹ Kai Yiu Chan (陳計堯),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to the Periodical Publications of the Maritime Customs in Southern Taiwan, 1863-95," *Asian Research Trends New Series*, 13 (2018), pp. 51-70.

² 〈1884 年淡水海關貿易報告〉，原名 "Tamsui Trade Report, for the Year 1884"，寫於 1885 年；〈1885 年淡水海關貿易報告〉，原名 "Tamsui Trade Report, for the Year 1885"，寫於 1886 年。收入黃富三、林滿紅、翁佳音編，《清末臺灣海關歷年資料》（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1997），總頁 646-649、678-681。

³ 黃富三、林滿紅、翁佳音編，《清末臺灣海關歷年資料》，總頁 646。

一年後，法來格在〈1885年淡水海關貿易報告〉的開頭則寫道：

去年〔1885〕始於一個不利的開端。港口被封鎖，北臺灣深陷戰事之中……然而，一個始料未及的變化，迅速地將情勢轉入佳境。⁴

並且為1885年的貿易盛況總結：

淡水〔1885年〕8個月的貿易額超越了1881年一整年的貿易額，是本口岸史上貿易最興盛、商業活動最活絡的一年。⁵

我們從法來格的紀錄中，可以感受到1884年至1885年對臺灣而言，可謂驚心動魄但卻峰迴路轉的一年。開港通商後，北臺灣的對外貿易活動蒸蒸日上，1881年迎來淡水貿易盛況的第一個高峰；且根據法來格的說法，即便已遭清法戰爭席捲，淡水1885年的貿易額甚至比戰前1881年全年度加總的貿易額要高。

⁴ 黃富三、林滿紅、翁佳音編，《清末臺灣海關歷年資料》，總頁678。

⁵ 黃富三、林滿紅、翁佳音編，《清末臺灣海關歷年資料》，總頁6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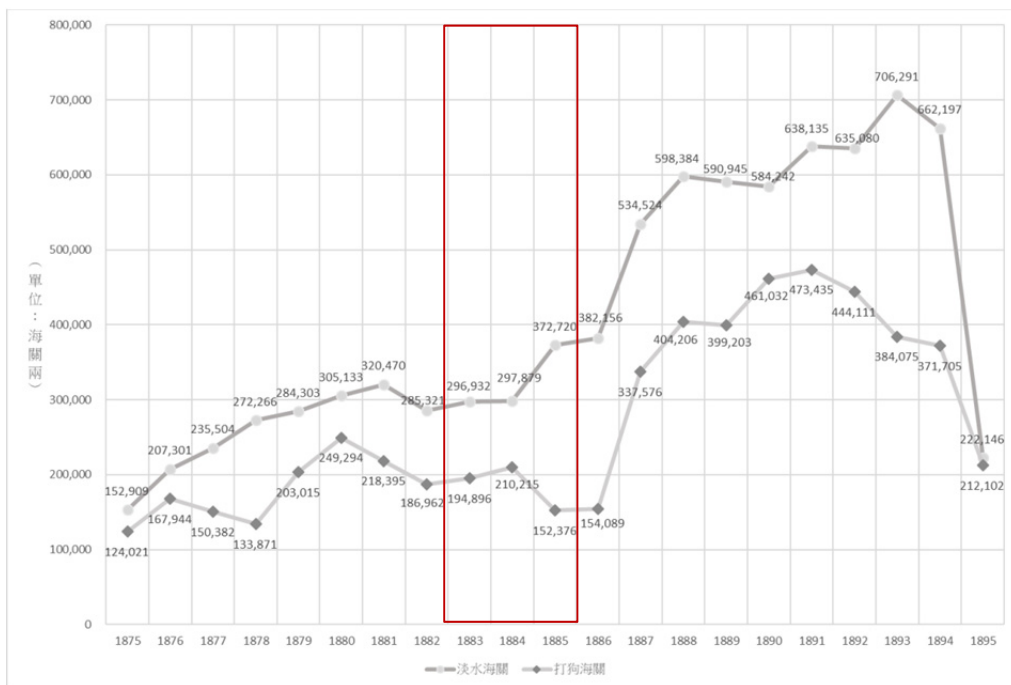


圖 1 1875-1895 年臺灣海關進出口關稅總額變化圖

說明：本圖上方線條為淡水海關，下方線條為淡水打狗海關；「圖 1」內之方框與「圖 2」皆以彩色呈現，原貌請參見《臺灣師大歷史學報》第 69 期全文電子檔。

資料來源：數據擷取自臺灣海關歷年的〈海關貿易統計〉，參見黃富三、林滿紅、翁佳音編，《清末臺灣海關歷年資料》。

從「圖 1」便能很明顯的觀察到 1875 年至 1895 年之間的關稅變化。清法戰爭期間，淡水海關稅收數額分別為 1883 年 296,932 海關兩、1884 年 297,879 海關兩、1885 年 372,720 海關兩，不降反升。甚至在清法戰爭後，淡水的關稅收入一路上升，雖偶有下跌，但幅度不大，整體而言呈成長趨勢，一直到 1894 年因為甲午戰爭才陡然下降。儘管臺灣經歷了法國艦隊的封鎖，但從淡水海關的統計數字來看，清法戰爭下的臺灣顯然與前面陶德提到的戰爭悲慘景象截然不同。此種對比不免讓人疑惑，究竟法國拉起的封鎖線起了多大的作用？而這條封鎖線實際上又封鎖了誰？

自 2000 年以後，因為政府發展淡水觀光之故，清法戰爭時的淡水歷史受到多方關注。除了淡江大學因為有「淡水學」的研究

方向規劃，而有不少研究成果外，2005年成立的新北市淡水古蹟博物館，更是多次召開清法戰爭滬尾之役的相關研討會，也陸續策劃了許多展覽，這些活動的成果，多半旨在梳理戰爭過程，以及深入研究參與戰役的人物（如孫開華、劉璈與劉銘傳），再結合戰役相關遺跡，呈現淡水在1884年至1885年時的歷史形象。⁶其中對於封鎖的探討，則多半以戰略的角度分析，或者考量其在外交上造成的影響，少有針對封鎖對臺灣經貿影響的具體討論。另外，若是討論封鎖期間的經驗則多以陶德的著作為根據。

陶德著作在臺灣廣為傳播，應與陳政三將陶德的*Journal of a Blockaded Resident in North Formosa during the Franco-Chinese War, 1884-5*翻譯為中文有關。2002年時陳政三將該書譯為《北臺封鎖記：茶商陶德筆下的清法戰爭》出版，之後又於2007年改名為《泡茶走西仔反：清法戰爭臺灣外記》再度出版。⁷對臺灣史學界而言，陶德的著作屬於英文史料，再加上經人翻譯，相對法文史料來說更便於利用。陶德著作本身更是以風趣的筆法寫成，因此該譯著即使是對臺灣史有興趣的一般讀者也有一定的吸引力。基於上述種種因素，陶德對清法戰爭期間淡水的描繪，便對臺灣史的論述有了一定的影響力。

不過，近年清法戰爭在臺灣的相關研究也開始引入法文史料，並有許多相關譯著出版。早期有格勞特（Eugène Garnot, 1857-1925）著、黎烈文翻譯的《法軍侵臺始末》（原文書名：*L'expédition française de Formose, 1884-1885*）。⁸近幾年則有《孤拔元帥的小

⁶ 相關研究參見：淡江大學歷史學系編，《第三屆淡水學暨清法戰爭120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淡江大學歷史學系，2004）；廖文卿主編，《清法戰爭滬尾戰役130周年研討會成果集》（新北：新北市立淡水古蹟博物館，2014）；柏麗梅主編，《清法戰爭滬尾之役135周年國際研討會論文集》（新北：新北市立淡水古蹟博物館，2019）。

⁷ 陶德（John Dodd）原著，陳政三譯述，《北臺封鎖記：茶商陶德筆下的清法戰爭》（臺北：原民文化，2002）；約翰·陶德（John Dodd）著，陳政三譯，《泡茶走西仔反：清法戰爭臺灣外記》（臺北：臺灣書房，2007）。

⁸ Eugène Garnot, *L'expédition française de Formose, 1884-1885* (Paris: Librairie Ch. Delagrave, 1894); 格勞特（Eugène Garnot）著，黎烈文譯，《法軍侵臺始末》（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

水手》（原文書名：*Le Mousse de L'amiral Courbet*）、《北圻回憶錄：清法戰爭與福爾摩沙，1884-1885》（原文書名：*Souvenirs du Tonkin: la guerre franco-chinoise et Formose, 1884-1885*）等史料出版，是臺灣參與清法戰爭的法軍留下的信件、手札，整理後出版的作品。⁹這些史料的整理，使得臺灣學界有越來越多研究者注意到可以外國人的視角來觀察臺灣當時的社會。像是楊玉菁〈清法戰爭時期歐洲人眼中的北臺灣——以《北臺封鎖記》與《孤拔元帥的小水手》為例〉，便結合了幾種文本呈現當時外國人眼中的臺灣。¹⁰

另一方面，關於清法戰爭在臺灣史上的意義，學界多著重在促成日後建省、清政府提升對臺灣的關注等面向。¹¹不過這些討論多著重於政治層面；本文試圖從淡水海關的紀錄出發，以臺灣條約口岸進出口活動，以及在封鎖線前線生活的人們為對象，並從該事件中不同參與者的角度分析法艦封鎖線對臺灣所造成的影響。重新提供過往歷史研究中對於清法戰爭時封鎖線下的「臺灣進出口情形之刻板印象」的新詮釋。

二、陶德筆下的封鎖線

由於我們對於封鎖線的印象多半來自陶德，因此實有必要理解一下陶德其人，以及其作品 *Journal of a Blockaded Resident in North Formosa during the Franco-Chinese War, 1884-5* 之產生脈絡。

陶德為蘇格蘭人，1838年生於英國蘭開夏郡（Lancashire）的普雷斯頓（Preston），1859年來港，並於顛地洋行（Dent & Co.）服務。據一些在顛地洋行工作時認識陶德的人們所述，他的

⁹ Jean L. 著，鄭順德譯，《孤拔元帥的小水手》（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2004）；何內·科邦（René Coppin）著，季茉莉（Julie Couderc）譯注，《北圻回憶錄：清法戰爭與福爾摩沙，1884-1885》（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2013）。

¹⁰ 楊玉菁，〈清法戰爭時期歐洲人眼中的北臺灣——以《北臺封鎖記》與《孤拔元帥的小水手》為例〉，《文史台灣學報》，1（臺北，2009.11），頁276-302。

¹¹ 例如：許雪姬，〈清法戰爭對臺灣的影響〉，收入淡江大學歷史學系編，《第三屆淡水學暨清法戰爭120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1-10（無總頁碼）。

父親曾在顛地洋行擔任船長，顛地洋行的創辦者與他們家族相熟。關於陶德的事蹟，較為人所知的部分都發生在臺灣，然而他與香港的關係顯然是相當緊密的。根據香港早期報紙 *The Hong Kong Weekly Press* 所述，他在香港時便小有名氣，以善於運動著稱，尤其賽馬，晚年他回到英國北威爾斯（North Wales）生活，直到他逝世當日，都持續訂閱該報。¹²除此之外，他也在香港和華人女子分別在1869年及1870年誕下女兒及兒子。¹³

早在1864年，陶德便已來臺；1866年，陶德即開始外銷臺灣茶葉給美國商人。¹⁴1867年，由於顛地洋行倒閉，加上怡和洋行（Jardine, Matheson & Co.）拋出橄欖枝，希望陶德為其代理北臺灣的業務，陶德遂接受怡和洋行的資助，於臺灣成立了自己的洋行寶順洋行（Dodd & Co.）。陶德花費了幾年的時間，和著名的商人李春生（1838-1924）合作，在臺灣站穩腳步，逐漸擴大其烏龍茶貿易，這也是他最為臺灣人所知的事業。他在臺灣活動時間甚長，如以1864年來臺貿易起算，自1890年離開臺灣返回英國，至少有26年的時間。¹⁵可以說陶德在臺的活動時間，幾乎涵蓋整個臺灣開港通商時期。不過從前面他與香港的聯繫可以推測他即便生意的中心在臺灣，仍不時往返於香港及淡水之間。他在淡水的事業促使他逐漸成為該地外國人社群中的重要人物，在臺期間亦陸

¹² Anonymous, "OBITUARY: THE LATE DR. S. R. HODGE THE LATE MR. JOHN DODD," *The North China Herald* (Shanghai), 2 Aug. 1907, p. 268. 參見 ProQuest Historical Newspapers: Chinese Newspapers Collection. <https://www.proquest.com/hnpchinesecollection/docview/1369518241/92E977A950E64C42PQ/1?accountid=14228> (2022/4/16); Anonymous, "DEATH OF MR. JOHN DODD," *The Hong Kong Weekly Press* (Hong Kong), 22 Jul. 1907, p. 43. 參見 Hong Kong Public Libraries' Collection of Old HK Newspapers. <https://reurl.cc/VL58XN> (2022/4/16).

¹³ Niki J. P. Alford, "A Barbarian's House by the River Tamsui: One House and the History of Its Many Occupants," *Journal of Family History*, 40: 2 (April, 2015), pp. 159-160.

¹⁴ Niki J. P. Alford, *The Witnessed Account of British Resident John Dodd at Tamsui* (Taipei: SMC Publishing Inc., 2010), pp. 1-31; 黃頌文，〈清季臺灣貿易與寶順洋行的崛起（1867-1870）〉，《臺灣文獻》，61：3（南投，2010.9），頁113-120。

¹⁵ Niki J. P. Alford, *The Witnessed Account of British Resident John Dodd at Tamsui*, pp. 1-31.

續接受美國與荷蘭在臺的外交相關職務。陶德在淡水的房子被附近的人們稱做「番仔樓」，因為那裡既是自家居所，也是接待外國友人的地方，是當地外國人社群的據點之一。¹⁶

他的臺茶貿易在 1870 年首度迎來高峰，烏龍茶成為美國紐約市場上的寵兒。但是命運並非總是一帆風順，陶德的事業有起有落，很快地，1872 年陶德的成功便引來其他英國商人的注意，競爭對手增加的情形下，茶葉成本提高，導致烏龍茶的價格一度被炒到高點。經營失利的陶德，曾一度準備出售他在基隆及淡水之房產。¹⁷

清法戰爭期間，陶德將在淡水的所見所聞投書於《孖刺西報》（*Hong Kong Daily Press*）上，戰爭結束後，因為他「幽默風趣」的報導深受讀者喜愛，便在報社編輯的鼓勵下，集結成冊，出版為 *Journal of a Blockaded Resident in North Formosa during the Franco-Chinese War, 1884-5*。¹⁸由於該書內容源自於報導，收錄成冊後仍保留原來的形式，因此該書便由各種長短不一的文章，按照記錄之日期排列，看上去有些像日記的格式。從陶德的紀錄中，我們不難發現，他時常強調封鎖帶來的不便。這些不便體現在幾個層面，包含飲食以及通訊。以下便以這兩個層面來探討陶德筆下的封鎖線。

首先是飲食的部分。相較於臺灣本地人來說，封鎖期間斷絕糧食補給，對外國人而言是更加難以忍受的事情。這是由於外國人有自己的飲食習慣，光是主食就大不相同，臺灣人食米，外國人則食用麥類食品。對外國人來說，有太多日常用品臺灣都不生產，為了維持這些飲食習慣，他們相當仰賴進口貿易。

¹⁶ Niki J. P. Alford, "A Barbarian's House by the River Tamsui: One House and the History of Its Many Occupants," pp. 155-161.

¹⁷ Niki J. P. Alford, *The Witnessed Account of British Resident John Dodd at Tamsui*, pp. 14-15.

¹⁸ John Dodd, *Journal of a blockaded resident in North Formosa during the Franco-Chinese War, 1884-5* (Hong Kong: Daily Press, 1888), editor's preface (without page number).

起先，法國將軍孤拔（Anatole-Amédée-Prosper Courbet, 1827-1885）宣布封鎖時，陶德最先關心的是他的貿易該如何是好，他認為封鎖期間因商船無法出港，則臺灣的對外貿易必將因此受到打擊，而這些貿易幾乎都由英國人經營。¹⁹但很快地他便開始意識到，不只他的事業，就連他在臺灣生活的基本需求都將開始受到影響。1884年11月15日時，陶德表示：「威士忌只剩幾瓶，但是紅酒、啤酒、雪莉酒都沒了。」²⁰當封鎖期間越來越接近聖誕節時，陶德也越發焦躁起來。他在11月24日抱怨道，英國流浪者號（*Wanderer*）送來補給品，但只提供給停泊在淡水港中的英國軍艦金龜子號（*Cockchafer*）上的官兵。為何這些補給品不能分給在臺外國人呢？在臺外國人在物資短少的情況下又要如何度過聖誕節？²¹到了12月22日時，他表示這陣子在臺外國人都過得很辛苦，需找人到處湊借啤酒、麵粉、餅乾、胡椒等民生用品，但苦撐一、兩週後，又重新面臨物資緊繃的狀態。²²至此為止，陶德看起來確實頗受封鎖線所苦。

然而，與前面他所哀嘆的種種不順遂不同的是，他在臺灣仍然過了一個不錯的聖誕節。在12月23日他記載道，麵包師們正想辦法要做出聖誕布丁以及碎肉餡餅。²³到了12月25日，也就是聖誕節當日，他享用著包含大片牛肉、火雞、肥滋滋的闖雞、布丁、派和蛋糕等美食的聖誕大餐，令他幾乎忘卻封鎖。²⁴以上這些食物顯然都不是在臺灣可以輕易取得的。

¹⁹ John Dodd, *Journal of a blockaded resident in North Formosa during the Franco-Chinese War, 1884-5*, pp. 66-68.

²⁰ John Dodd, *Journal of a blockaded resident in North Formosa during the Franco-Chinese War, 1884-5*, pp. 75-76.

²¹ John Dodd, *Journal of a blockaded resident in North Formosa during the Franco-Chinese War, 1884-5*, p. 79.

²² John Dodd, *Journal of a blockaded resident in North Formosa during the Franco-Chinese War, 1884-5*, pp. 90-93.

²³ John Dodd, *Journal of a blockaded resident in North Formosa during the Franco-Chinese War, 1884-5*, pp. 93-94.

²⁴ John Dodd, *Journal of a blockaded resident in North Formosa during the Franco-Chinese War, 1884-5*, p. 95.

儘管從陶德的記述中可以讀到許多戰爭期間的不得意，但我們也不可忽略，他仍然在戰時設法維持西方人的生活飲食習慣，而且總是能從「某處」獲得酒、食物以及日常用品，然而在他的記述中幾乎未曾看過英國海軍軍官將補給品分享給他們這些在臺外國人的紀錄，雖然實情究竟如何我們不得而知，但是從陶德其他日期的紀錄中，可以推知這些補給品很有可能是透過走私而來。

在 1885 年 1 月 26 日的紀錄中，他便談道，英國船隻送來的補給品仍然僅提供給金龜子號的官兵，一般的在臺外國人仍然沒有足夠的物資。幸好「本地雜貨商」提供了物資，但他們大敲竹槓：麵粉每袋 4 元、馬鈴薯一擔 7.2 元、煤油每瓶從 2 元漲到 5 元，沒有蠟燭，火柴漲了一倍，食物平均漲 3 成至 4 成。²⁵雖然他沒有說這位本地雜貨商是誰，但是可以推斷在外國商人束手無策時，本地商人有別的辦法突破封鎖線，取得物資。

這不免使人疑惑，倘若封鎖真的像他所形容的那樣嚴密，那麼陶德的聖誕大餐又從何而來呢？甚至在聖誕節後，陶德還和英國海軍、淡水海關的外國職員等在臺外國人苦中作樂，舉辦了划船比賽。²⁶凡此種種，似乎在他身上感受不到多少封鎖線造成的痛苦。

其次是通訊的問題。作為一個商人，通訊對陶德來說應是相當重要的，然而信件也成為法艦攔阻的物品之一，他時常在記錄中抱怨通訊不便。1884 年 11 月 11 日，他提到寄來臺灣的信件被法艦攔阻，淡水海關派出小艇才從法艦領回這些信件。²⁷此時的他尚能收到信件，之後信件便時有時無。例如在 11 月 26 日時，又有信件送來，但陶德表示只有英國領事館人員、金龜子號的官兵能收

²⁵ John Dodd, *Journal of a blockaded resident in North Formosa during the Franco-Chinese War, 1884-5*, p. 104.

²⁶ John Dodd, *Journal of a blockaded resident in North Formosa during the Franco-Chinese War, 1884-5*, pp. 95-96.

²⁷ John Dodd, *Journal of a blockaded resident in North Formosa during the Franco-Chinese War, 1884-5*, p. 75.

到家書和補給品，其他在臺外國人則無法收到，傳聞是孤拔將軍阻攔所致。²⁸諸如此類的抱怨在他的書中隨處可尋。

儘管在陶德筆下，身處封鎖線下的他過著次等公民般的生活，被剝奪了對外聯通的權利，但值得注意的是，確實也有成功傳遞書信的紀錄。1884年12月23日，陶德除了記錄聖誕節準備的情形外，還談到，有個聰明人將信件裝在烘焙粉的盒子裡，成功偷渡上岸。到了1885年1月的時候，更有英國船隻帶著信件至南部海關，暫時存放於臺灣府。3月時英國皇家海軍兩燕號（*Swift*）則是直接將信件送至淡水，只是停靠時間短暫，那些甫收到信件的人甚至還來不及回信，兩燕號便駛離港口了。²⁹此外，我們也可以合理懷疑，假使陶德真的難以與外界通訊，他又是如何將他的封鎖見聞投遞到《孖刺西報》的呢？

回查《孖刺西報》，大概可以推測1884年10月23日宣布封鎖以後，到12月初為封鎖最嚴格的時間。陶德從10月23日至11月24日共33則的報導皆在12月2日的《孖刺西報》刊登。³⁰但是12月2日至12月21日共19則報導全數刊登在12月30日的《孖刺西報》上。³¹由上述刊登時間可以推測，從臺灣送出報導至香港並編輯完成刊登，大約需要花費8天至9天，但初封鎖時，陶德一個多月後才有機會將報導傳遞送出，而12月時，不到三週的時間陶德便有機會將報導傳送而出。1885年的3月，更分別在17日刊登自2月4日至3月2日共27則報導，以及26日刊登自3月3日到3月6日的報導共

²⁸ John Dodd, *Journal of a blockaded resident in North Formosa during the Franco-Chinese War, 1884-5*, pp. 80-81.

²⁹ John Dodd, *Journal of a blockaded resident in North Formosa during the Franco-Chinese War, 1884-5*, pp. 93-94, 103-104, 114-115.

³⁰ John Dodd, "EVENTS IN NORTH FORMOSA," *Hong Kong Daily press* (Hong Kong), 2 Dec. 1884, pp. 2-3. 參見Hong Kong Public Libraries' Collection of Old HK Newspapers. <https://reurl.cc/VL587b> (2022/4/16).

³¹ John Dodd, "EVENTS IN NORTH FORMOSA," *Hong Kong Daily press* (Hong Kong), 30 Dec. 1884, p. 2. 參見Hong Kong Public Libraries' Collection of Old HK Newspapers. <https://reurl.cc/Rzbvkr> (2022/4/16).

4則。即是說3月時有兩次傳遞訊息的機會。³²總而言之，假使報紙刊登的頻率可以代表臺灣通訊的封鎖程度，那麼由此可推知，封鎖並非長時間高強度，也絕非密不透風。

至此我們可以合理懷疑，陶德在某程度上誇大了法艦封鎖的有效性。他如此為之的目的，我們能從該書的序言窺探一二：

本書最早刊登於《孖刺西報》，該專欄在清法戰爭期的敵意之中，格外引人注目……陶德先生生動且時而幽默的描繪了在孤拔艦隊的砲擊及封鎖下，淡水外國人所面臨的危機、擔憂以及物資匱乏。引起許多香港及其他條約口岸人們的同情……。³³

在那些報導集結成冊出版時，編輯為其所著的序言，透露了陶德在戰時投書報紙的舉動，便是為了要引起其他外國人的注意力。陶德用幽默的筆法描寫戰爭，藉此吸引讀者目光，並適時地以悲慘的內容博取同情。他所做的這一切，不過是希望透過輿論壓力，儘早解除法國對淡水的封鎖。我們甚至可以懷疑，他三番兩次在文章中抱怨英國海軍的不作為，意在希望英國趕緊出手幫忙解決清法間的僵局。

當然，封鎖線必定對臺灣造成影響，陶德所記述的事情也未必就都不正確，但其嚴重程度到底為何？難道真像陶德所述，島上的人們都因此勒緊褲腰帶過著與世隔絕的日子嗎？不同於外國人的生活習慣，本地人難道也會受到如陶德書中所述的影響嗎？

³² John Dodd, "EVENTS IN NORTH FORMOSA," *Hong Kong Daily press* (Hong Kong), 17 Mar. 1885, p. 2. 參見Hong Kong Public Libraries' Collection of Old HK Newspapers. <https://reurl.cc/nD5DRX> (2022/4/16); John Dodd, "EVENTS IN NORTH FORMOSA," *Hong Kong Daily press* (Hong Kong), 26 Mar. 1885, pp. 2-3. 參見Hong Kong Public Libraries' Collection of Old HK Newspapers. <https://reurl.cc/ZWjX3A> (2022/4/16).

³³ John Dodd, *Journal of a blockaded resident in North Formosa during the Franco-Chinese War, 1884-5*, editor's preface (without page number).

三、法國艦隊眼中的封鎖線

清法戰爭在1884年8月期間擴大至臺灣，以法艦對基隆砲擊揭開序幕，然而法軍出師不利，並未獲得他們所預想的效果。據白詩薇（Sylvie Pasquet）研究，因法國的進攻始終未能使清政府讓步，為了進一步施加壓力，法國開始在幾個地點之間考慮，是要直接威脅北京，或者是往廣州前進？最後，法國選擇攻打臺灣，希望藉由占領臺灣作為擔保品，要求清政府妥協。然而，要拿下臺灣，對法軍而言也並非易事，為了防止軍隊及軍需品送往臺灣，因而有法艦封鎖臺灣的契機。被指派對臺作戰的法國海軍中將孤拔認為此舉不僅無效，且顯現了法國的軟弱。他也並不贊同封鎖。³⁴

法艦對臺灣所實施的封鎖，屬於「和平封鎖」（Pacific Blockade）。在十九世紀，這種國際關係之做法在各國之間慢慢被接受。和平封鎖的目的不在引發戰爭，而是希望在不宣戰的情況下，透過封鎖一個國家的海域或者港口，對其施加壓力，進而懲罰被封鎖的國家，或者使被封鎖的國家同意進行談判。在十九世紀以前，封鎖一向被認定為是交戰國的權利，但在十九世紀，各國平時也有實施封鎖措施，尤以英、法兩國實施最多。³⁵

儘管孤拔不贊同政府的做法，但他也只能遵照政府的意思。這種封鎖的辦法其實就是一種拖延戰術，是法國為了避免與其他國家——尤其是英國——直接起衝突的手段；並藉此與清政府處在一種既是敵對但又不宣戰的狀態。³⁶顯然，法國的戰力並不足以使他在海外為所欲為，從戰術的選擇上來看，法國希望儘可能減少戰爭成本達成目的。但英國也看透了法國避免戰局擴大的盤

³⁴ 白詩薇（Sylvie Pasquet），〈從法國史料來看清法戰爭在淡水（一八八四年）〉，收入淡江大學歷史學系主編，《二〇〇一年淡水學學術研討會——歷史、生態、人文論文集》（臺北：國史館，2003），頁7-21。

³⁵ 杜蘅之，《國際法大綱》（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1），頁462；陳治世，《國際法》（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5），頁489。

³⁶ 何內·科邦著，季茉莉譯注，《北圻回憶錄：清法戰爭與福爾摩沙，1884-1885》，頁4-5。

算，因此對法國提出抗議，並威脅如果再不尋求其他和平手段解決問題，英國就必須打破中立立場，加入戰局。³⁷英國的態度確實也表現在那些試圖穿越封鎖線支援清朝的船隻上，稍後我們將會在法軍的紀錄中看到相關情形。

總而言之，對臺的封鎖主要是為了在不貿然擴大戰場的情況下，向清政府施加壓力。孤拔對臺灣的封鎖，正式起始日為 1884 年 10 月 23 日，解封之日為 1885 年 4 月 15 日，封鎖範圍起自北緯 21 度 55 分、東經 118 度 30 分的南岬，經臺灣西岸繞行至北臺，延伸至東岸北緯 24 度 30 分、東經 119 度 34 分的蘇澳為止。³⁸但事實上，法艦對臺灣的封鎖遠早於這個時間點，實質結束時間也晚於這個時間點。

格勞特為當時隨孤拔攻臺的法軍之一，並記錄了整個法軍對臺作戰的過程。在他的書中便曾提到，1884 年 8 月 4 日時，有法艦欲攔截德國貨船（該貨船上運載砲彈及魚雷）但失敗，因為此時法國尚未對清國宣戰也未宣布封鎖，德國貨船的船長認為他作為中立第三方，並不需要服從法艦的命令。³⁹但是也有攔截成功的例子，如 1884 年 9 月 26 日，法國砲艦 *Vipère* 號便曾阻止來自上海的英國船運載 150 名中國人入淡水港。⁴⁰總而言之，在法軍沒有正式宣戰或者宣布封鎖前，對清政府其實難有更進一步的威嚇作用。

平時封鎖的成立，必須符合幾項要件：1. 藉以解決爭端的談判破裂，2. 向被封鎖國宣告封鎖意思、封鎖起始日以及封鎖範圍，3. 能以武力手段有效攔阻企圖穿越封鎖線或破壞封鎖線者。⁴¹在 1884 年 10 月 23 日以後，前兩項要件都已達成，但第三項的有效性，很值得我們細究，因為根據格勞特的說法，要達到封鎖的有

³⁷ “Earl Granville to M. Waddington,” 31 October 1884,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 China* (Shannon, Ireland: Irish University Press, 1971), vol. 29, p. 451. Earl Granville 為 Granville Leveson-Gower (1815-1891)，是當時的英國外交大臣，M. Waddington 則為 William Henry Waddington (1826-1894)，是當時的法國駐英國大使。

³⁸ 格勞特著，黎烈文譯，《法軍侵臺始末》，頁 39、106。

³⁹ 格勞特著，黎烈文譯，《法軍侵臺始末》，頁 12-13。

⁴⁰ 格勞特著，黎烈文譯，《法軍侵臺始末》，頁 25。

⁴¹ 陳治世，《國際法》，頁 489-490。

效性是十分困難的。

在武力方面，法艦實有能力攔截突破封鎖線的船隻。根據孤拔艦隊的軍醫何內·科邦（René Coppin, 1861-1926）記述，封鎖線內所有的船隻不能駛出海岸5海浬之外，否則就會被攔截，封鎖線外的船隻倘或駛進5海浬之內，法艦亦得扣押船隻。他也詳細地描述了法艦實際遇上中式帆船與其他船隻時的處理程序。首先，法艦會駛近船隻並用砲彈示意他們停下接受檢查，若檢查後有走私違禁品，該違禁品便會遭到扣押，而若船隻並未在砲響後停下，法艦會開第二砲，以確保船隻理解砲擊的意思。若兩發砲擊後船隻仍執意航行，法艦將持續開砲直到把船隻擊沉為止。⁴²然而在封鎖範圍上，法艦卻顯得心有餘而力不足。

格勞特引述孤拔的看法，指出有效的封鎖必須是兩艘艦艇為一組，彼此相望，但實際上要在臺灣達到這樣的成效，推估至少要有40艘艦艇，而他們手上所能分派的船艦，僅為四分之一的數量而已，要監視的海域範圍遠大於現有可支配的艦艇。加上在和平封鎖下，法艦不能在封鎖區外盤查中立國的船隻，因此海上那些載運軍需品的中立國船隻，肯定會逮到機會鑽過封鎖線。⁴³

就連在孤拔麾下服役的一位署名Jean L.的年輕水手，亦對法艦的封鎖看得相當透澈。他指出表面上法國不與中國打仗，但事實上彼此卻打得非常厲害，看起來就像戰爭。然而他又諷刺地說：「嘿！才不是呢。我們戰到宣布封鎖，不過，這不算是封鎖，到底是不是封鎖？看你自己得出什麼結論。」他的結論是：法艦有權利查看可疑船隻，但是它們不會受到法艦的控制。這場和平封鎖四不像，除非有戰艦阻擋在前，否則中立船都可通過。真正有用的封鎖要付出高昂的軍費，需要有許多船隻才能拉起一條昂貴的封鎖線。⁴⁴

⁴² 何內·科邦著，季茉莉譯注，《北圻回憶錄：清法戰爭與福爾摩沙，1884-1885》，頁114-115。

⁴³ 格勞特著，黎烈文譯，《法軍侵臺始末》，頁39-42。

⁴⁴ Jean L.著，鄭順德譯，《孤拔元帥的小水手》，頁56-57。

事實上法國在清法戰爭期間投入的海上戰力相當龐大，不僅規模大於法國本土的艦隊，甚至創下超越法軍駐亞洲的紀錄。據研究，如果將換防軍艦、徵用、租用的船舶列入計算，總計孤拔在清法戰爭期間前後動用的船艦總數高達 50 艘，包含巡洋艦 24 艘、偵巡艦 1 艘、砲艦 9 艘、杆雷艇 4 艘、運輸艦 6 艘，以及其他船隻 6 艘。⁴⁵不過這些船艦並非一次到位，而是在對臺作戰的期間陸續增援而來。一開始 1884 年 8 月砲擊基隆時，僅有由海軍少將李士卑斯（Sébastien-Nicolas-Joachim Lespès, 1828-1897）率領的巡洋艦 *La Galissonnière* 號、砲艦 *Lutin* 號以及巡洋艦 *Villars* 號。之後才又有巡洋艦 *Bayard* 號增援，而同一時間孤拔正率領其餘艦隊攻擊閩江沿岸。⁴⁶

1884 年 9 月時，法國政府尚在猶豫著下一步該如何進行，因此大部分的船艦都停泊在馬祖待命，只有部分船隻輪流至基隆進行封鎖。格勞特並未在此說明一般前去封鎖基隆的船艦有幾艘，但是從 9 月 2 日孤拔乘船前往基隆視察時，看到港灣停泊著 *Bayard* 號及 *Lutin* 號，可以推估至少有兩艘艦艇維持封鎖。9 月底時，為了更進一步對臺作戰，又增派了船艦前往基隆及淡水，如以作戰為主的巡洋艦、砲艦來看，彼時在基隆有巡洋艦 *Bayard* 號、*Lutin* 號、*Duguay-Trouin* 號、*Château-Renaul* 號和砲艦 *Aspic* 號，派往淡水的則有巡洋艦 *La Galissonnière* 號、*Triomphante* 號、*d'Estaing* 號。到了 11 月又有 3 艘巡洋艦增援。如果將上述各式巡洋艦及砲艦加總，大約十來艘艦艇可供封鎖之用，但孤拔仍覺得不夠維持封鎖之用，他認為船艦與船艦之間的距離太大，很容易為中立國趁隙鑽入。⁴⁷艦艇的不足甚至使得孤拔在 1884 年 12 月，為了應付清政府派出的其他艦艇，不得不召回船隻，放棄對南臺灣的封鎖，僅著重封鎖淡水和基隆。這樣的情形一直維持到隔年 1 月，才又再派遣巡洋艦 *Triomphante* 號、*d'Estaing* 號、*Champlain* 號巡邏臺南、打狗、

⁴⁵ 紀榮松，〈參與清法戰爭的法國巡洋艦、砲艦和杆雷艇〉，《淡江史學》，22（臺北，2010.9），頁 147-188。

⁴⁶ 格勞特著，黎烈文譯，《法軍侵臺始末》，頁 12-14。

⁴⁷ 格勞特著，黎烈文譯，《法軍侵臺始末》，頁 16-18、22-29、31-39。

澎湖附近之海域。⁴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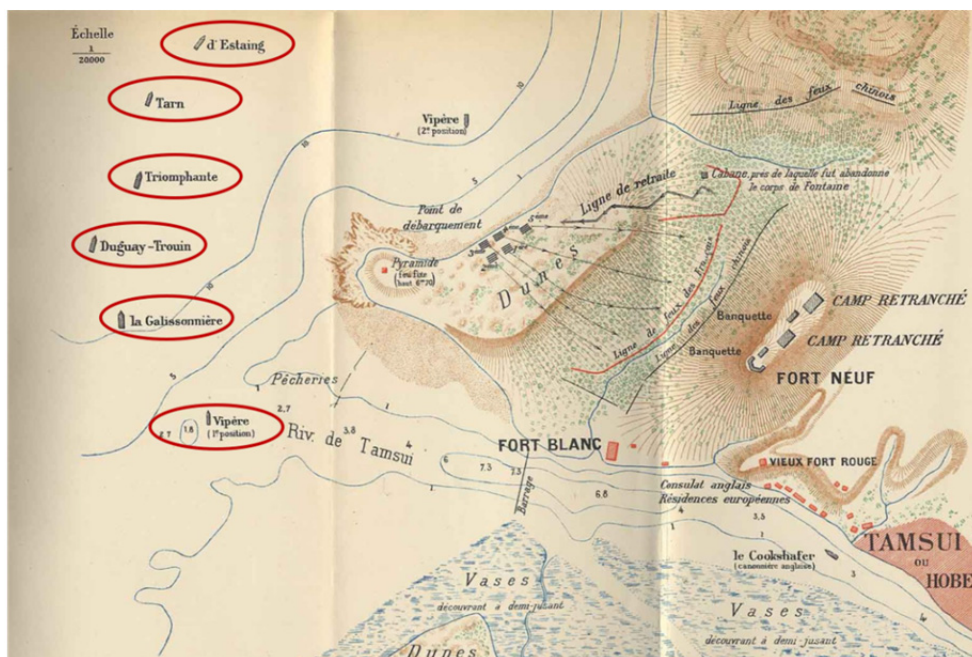


圖2 Entrée du port de Tamsui, combat du 8 Octobre 1884
(淡水港入口，1884/10/8 戰役)

說明：圖中左側船名圈起之圖示乃筆者自行加註。

資料來源：原收入 Garnot, Eugène. *L'expédition française de Formose, 1884-1885*. Paris: Librairie Ch. Delagrave, 1894. Formosa Nineteenth Century Images. <https://rdc.reed.edu/i/c8af9646-779d-45ff-8d2a-372246b6979d> (2022/8/22)

從「圖2」可見，孤拔派遣了6艘船艦攔在淡水河口，要對淡水進行作戰，封鎖或許不必動用這麼多艘船隻，但從圖中港口與法艦的相對大小推測，封鎖淡水也非僅憑一艘法艦便可順利完成。

從以上討論可知，要實行海上封鎖並非易事，縱使孤拔陸續調來船艦支援，仍無法持續並全面地封鎖臺灣沿海，更遑論其宣告的封鎖範圍僅包含一部分東部海域（封鎖僅至蘇澳）。有諸多證據顯示，法國艦隊僅能對臺做到部分封鎖，其中以北臺灣為

⁴⁸ 格勞特著，黎烈文譯，《法軍侵臺始末》，頁50、61。

重。

此種封鎖效力的差距從海關職員的編表工作也能窺知一二。中國各條約口岸的海關報告依規定都要傳回上海，由上海的海關造冊處（The Statistical Department at Shanghai，以下簡稱造冊處）彙整出版，再送至北京供總稅務司（Inspector-General）赫德（Robert Hart, 1835-1911）閱覽。⁴⁹然而由於法軍的封鎖，導致1884年第四季的《海關貿易季報》（*Customs Gazette. No. LXIV. October-December 1884*）獨缺淡水海關的數據，因直到出版時（1885年2月13日）淡水海關的報告都還未傳回造冊處。⁵⁰但同一時間的打狗海關卻不受影響，雖然從其季報數字來看，確實無論在進出口方面，貿易量明顯下跌，但相較於連報告都未見蹤影的淡水海關，打狗海關的報告仍在海關造冊處印刷出版前，準時送抵上海。⁵¹可見在臺灣的條約口岸中，法艦能較嚴密封鎖的也只有北臺灣的條約口岸。

至於突破封鎖線的手段則花樣百出，無論是在法軍、清政府或者是陶德的記錄中都有跡可循。格勞特在其著作中談到，臺灣島上的人民會在沿岸觀察是否有法艦巡邏，如有便按法艦的數量點火示意，甚至在法艦移動時，火光也會隨之移動，使意欲突破封鎖線的船隻能在海上便知悉法艦的佈防數量及動向。⁵²Jean L.則指出，中國人乾脆把汽船賣給美國的公司，掛上美國的旗幟後，中國船便直接成了中立船。英國人也行挑釁之事，Jean L.談到，有個英國人駕駛懸掛中國國旗的砲艇，用補給燈塔物資的名義穿越封鎖線，結果兩天後便往臺灣府衝去了。⁵³此外，從陶德的紀錄中也能看到，大部分被封鎖的都是經由條約口岸進出的外國大船，

⁴⁹ 吳松弟編，《美國哈佛大學圖書館藏未刊中國舊海關史料（1860-1949）》（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第1冊，頁2。

⁵⁰ 吳松弟編，《美國哈佛大學圖書館藏未刊中國舊海關史料（1860-1949）》，第53冊，頁3、103。在目錄頁即有未收到淡水海關的數據之標示。

⁵¹ 吳松弟編，《美國哈佛大學圖書館藏未刊中國舊海關史料（1860-1949）》，第53冊，頁183-186。

⁵² 格勞特著，黎烈文譯，《法軍侵臺始末》，頁39。

⁵³ Jean L.著，鄭順德譯，《孤拔元帥的小水手》，頁58-60。

中式帆船往往能從其他地方出航，穿越封鎖線走私。⁵⁴從清政府的公文書中也可窺見突破封鎖線的辦法：將士兵送往卑南廳（今日臺灣東部），再令其繞行至北臺灣。⁵⁵從以上種種情形，都可知法艦的封鎖線並非牢不可破，也並非自始至終都能發揮效力。

四、從海關報告看封鎖線的影響

既然封鎖線並不如陶德所述的這般嚴重，那為何他要再三強調在臺外國人的「悲慘處境」呢？我們可以嘗試從淡水海關報告來分析封鎖線造成的影響，進而推測受到封鎖線影響的對象為何。

這裡我們先來談談當時作為法國主要封鎖地區——淡水及基隆——的情形。這兩地作為通商口岸，可以說是外國人在臺灣合法的活動區域，尤其是淡水，除了本地人、清軍外，更是在臺外國人重要的生活區域。這裡除了有海關、英國領事館，尚有洋行、馬偕醫館等各種外國人的機構。一旦受到封鎖，居住此地的居民，包含這群外國人，可謂首當其衝。進而如能更進一步了解這群外國人的組成，法艦的攻擊及封鎖對他們又造成何種影響，我們或能對這場戰役有更深的認識。

首先，應先檢視淡水海關。一直以來，海關在各個條約口岸常作為外國人以及本地人之間橋樑。這是由於這群海關職員的特殊屬性：雖為西方人出身，但隸屬於清政府的新式海關體系，是領清政府俸祿，並且為清政府效力的正式官員。淡水海關即屬於此種新式海關體系，它的設立源於1858年《天津條約》的簽訂，根據條約之相關內容，清政府必須在通商口岸設置海關，招募外國人作為稅務司，在口岸負責洋船的相關稅務。⁵⁶這種由外國人管

⁵⁴ John Dodd, *Journal of a blockaded resident in North Formosa during the Franco-Chinese War, 1884-5*, p. 114.

⁵⁵ 清·劉銘傳撰，馬昌華、翁飛點校，《劉銘傳文集》（合肥：黃山書社，1997），奏議卷3，〈法攻暖暖月眉山連日獲勝並現在戰守情形摺（光緒十年十二月廿四日臺北府發）〉，頁117-120。劉銘傳時任福建巡撫。

⁵⁶ 海關總署《中外舊約章大全》編纂委員會編，《中外舊約章大全》（北京：中國

理的海關，又稱為洋關或新關。⁵⁷基隆海關在規模上被視為淡水海關的分關，兩者皆設立於1863年。⁵⁸

在地方海關中，最高層級的管理者為稅務司。清法戰爭期間的淡水海關稅務司為法來格，其為一位匈牙利人，亦在英籍人士為主的新式海關中屬於少數分子。他於1873年開始在大清海關服務，首先在漢口、宜昌等海關工作，並於1881年3月被總稅務司赫德提拔為稅務司。⁵⁹法來格升為稅務司後，一開始在總稅務司署服務，之後便在各個海關之間流轉，展開他的稅務司生涯。他曾擔任過天津、淡水、拱北（位於澳門）、福州及上海等海關的稅務司，並於1900年退休。淡水海關為法來格作為地方海關稅務司的第二站，他在淡水海關的任期為1884年至1885年。⁶⁰法來格在任期間，正是臺灣捲入清法戰爭的期間。

法來格被指派來臺，或許不是偶然。赫德對於提拔法來格為

海關出版社，2004），頁298、379。《中外舊約章大全》主要影印自舊海關總稅務司署造冊處編纂出版的《中外條約匯編》，其主要參考書目包含：海關總稅務司造冊處1887年內部版《中外條約匯編》、1908年公開版《中外條約匯編》、英國牛津大學出版社美國紐約分社1921年出版《與中國簽訂的條約和協定》、由黃月波、于能模、鮑厘人於1935年編著之《中外條約匯編》、1884年日本東京圖文社出版之《締盟各國條約匯編》、1886年天津關書局出版之《通商約章類纂》、1957年王鐵崖編《中外舊約章匯編》等。條約正本由中華民國外交部移交，現保存於國立故宮博物院。

⁵⁷ 參考陳詩啟，《中國近代海關史（晚清部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頁62-74。

⁵⁸ Robert Hart, "Hart's Memorandum of November 1864 on the Foreign Customs Establishments in China," 收入吳松弟編，《美國哈佛大學圖書館藏未刊中國舊海關史料（1860-1949）》，第250冊，頁177-182。

⁵⁹ "Service List. Tenth Issue (Corrected to 1st July 1884)," 收入吳松弟編，《美國哈佛大學圖書館藏未刊中國舊海關史料（1860-1949）》，第232冊，頁483-590；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譯室編，《近代來華外國人名辭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頁134；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人名權威檢索系統》。<http://archdtsu.mh.sinica.edu.tw/imhkmc/imhkm?0005E647002A030100000000000A00A00000003E000000000^1> (2020/10/27)。

⁶⁰ "Service List. Tenth Issue (Corrected to 1st July 1884)," 收入吳松弟編，《美國哈佛大學圖書館藏未刊中國舊海關史料（1860-1949）》，第232冊，頁483-590；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譯室編，《近代來華外國人名辭典》，頁134；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人名權威檢索系統》。<http://archdtsu.mh.sinica.edu.tw/imhkmc/imhkm?0005E647002A030100000000000A00A00000003E000000000^1> (2020/10/27)。

稅務司的解釋是：「這種選擇會使許多人大吃一驚，但從我的觀點來看，為了工作和世界主義，這是一種巧妙的『結合』。」⁶¹根據李愛麗的研究，赫德在分派稅務司時，確實會有國籍上的考量。像是臺灣、蒙自、思茅等地的海關，屬於清版圖的邊緣地帶，各國為了利益時常在這些邊緣地帶發生衝突，因此赫德會選派國籍與這些參與衝突的歐洲國家（多半是英、法、德等國）較不相干的稅務司赴任，例如1894年至1895年間臺灣不論南北的海關都由美籍稅務司管理。⁶²清法戰爭期間的法來格想來也是基於同樣的考量被指派到臺灣。「表1」為1884年任職於淡水海關的洋員名單，如果我們更進一步細看，將會發現，當時整個淡水海關竟無半位法籍人士任職。

表1 1884年淡水海關的海關洋員名錄

職稱	姓名	國籍
稅務司 (commissioner of customs)	法來格 (Edmond Faragó)	匈
四等幫辦 (4th Assistant)	鮑琅樂 (M. F. Brownlow)	英
署理頭等總巡 (Acting Tidesurveyor)	胡美利 (G. L. Hummel)	德
三等驗貨 (Assistant Examiner)	蘇維德 (R. Macgregor)	英
二等鈐子手 (2nd Class Tidewaiter)	蒙德立 (H. H. Montell)	美
	邁卓爾 (G.A. Meyer)	德
三等鈐子手 (3rd Class Tidewaiter)	葛蘭得 (R. Grant)	英
	客禮 (N. Currie)	英
未列等 (Miscellaneous)	支業世 (J. Jaques)	英
醫員 (Surgeon)	周漢森 (C. H. Johansen)	德

資料來源：“Service List. Tenth Issue (Corrected to 1st July 1884)” 收入吳松弟編，《美國哈佛大學圖書館藏未刊中國舊海關史料（1860-1949）》，第232冊，頁483-590。

接著，我們可以從淡水海關的檔案觀察北臺灣的進出口貿易情形，以及外國商人的組成。清末海關檔案的復刻版本頗多，本

⁶¹ 〈赫德致金登幹〉，信函791，1881年3月10日，收入陳霞飛編，《中國海關密檔：赫德、金登幹函電匯編（1874-1907）》（北京：中華書局，1990），卷2，頁519-520。

⁶² 李愛麗，《晚清美籍稅務司研究——以粵海關為中心》（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頁45。

文為聚焦於臺灣，因此多引用《清末臺灣海關歷年資料》此一版本，該書收錄臺灣條約口岸的海關年度報告，即淡水關及打狗關，每年的報告原則上包含以文字為主的貿易報告，和以數據為主的貿易統計兩部分，由於海關由洋人所管理，因此報告內文主要也由英文寫成。據〈1884年淡水海關貿易統計〉，進出淡水口岸的船隻中，以英國船及德國船最多，其他尚有丹麥船、俄羅斯船以及暹羅船，但未見半艘法國船。⁶³英商陶德的書中也描述到，淡水口岸大部分的外國屋舍插著英國旗幟，其中間或一、二支德國國旗。⁶⁴由此可見，法國在北臺灣並無多少經營，法軍無須考慮攻擊淡水、基隆兩地是否會破壞法國人在此地的發展。

在臺外國人並未因為同為西方人而得到法國人太多的憐憫，在法艦的轟炸下，淡水港畔的外國人活動區，被炸得滿目瘡痍，包含陶德的寶順洋行、被選為避難所的得忌利士洋行、馬偕牧師的住所、海關稅務司的辦公室、紅毛城、英國領事館。⁶⁵雖然交戰的清軍也傷亡慘重，但若就非軍方的在臺人員而言，只有通商口岸地區（尤其北臺灣）較為緊張。

前一節已討論過封鎖線的效力對臺灣本身並未發揮如法國預期的功效。那麼在實際上，從商貿的角度來看，封鎖對臺灣到底影響為何？我們可從臺灣的茶葉貿易來看。法來格在他的報告中引用了一篇由「淡水某茶葉龍頭的好心助理」所準備的 1884 年茶業評論：

有鑑於1883年無論是生產者、包裝業者以及出口業者，都獲得了高額的利潤，在年中時便已可確定未來將擴大產業規模。本地人的茶葉包裝商行（Native packing hong）在大稻埕如雨後春筍般設立，從原有的 50 間增為 80 間。資本

⁶³ 黃富三、林滿紅、翁佳音編，《清末臺灣海關歷年資料》，總頁650。

⁶⁴ John Dodd, *Journal of a blockaded resident in North Formosa during the Franco-Chinese War, 1884-5*, pp. 27-28.

⁶⁵ John Dodd, *Journal of a blockaded resident in North Formosa during the Franco-Chinese War, 1884-5*, p. 30.

(fresh capital) 挹注進這個地區 (country)，相較於前一年，貨幣更為流通，借貸更為容易。這一切都導致市場上對於第一批茶葉收穫量的競爭更為激烈、價格更為高昂……在五月初，從紐約傳來的消息指出市場已經萎縮了，較後來的進口商承擔了龐大的損失，市場預設價格會下跌，貿易前景堪憂。之後價格隨即下跌……。⁶⁶

在這篇評論中我們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臺灣的茶業市場，如何與紐約市場緊密連結，也可以觀察到在北臺灣被封鎖以前，茶產業其實呈現低靡狀態。

這一波下跌對於北臺灣而言，無疑是一大打擊。北臺灣的氣候及地形適宜產茶，在1880年代茶業也已經成為北臺灣最主要的產品，法來格甚至表示茶葉為外國商人在北臺灣唯一感興趣的產品。⁶⁷陶德作為茶商，想來在這一波茶價下跌中，也難免受到影響。自1870年代起，臺灣的茶葉逐漸受到美國紐約消費者的青睞，使得兩地的茶葉市場緊密連結。⁶⁸但此時遠在太平洋另一端的紐約，因市場對茶葉的需求減少，導致大稻埕的茶葉價格在收到消息後不久便也隨之下跌。然而到了8月，卻又因法軍對基隆發動砲擊，導致商人們出於產量減少的預期而爭相收購，使得茶葉價格再度上升。⁶⁹

遺憾的是，茶價上升對茶商並無好處。雖然1884年8月基隆遭受砲擊後，貿易便難以正常進行，但自1884年10月23日港口封鎖起，至該年年底，除了少部分由西部沿海的中式帆船載運的小包裝茶葉外，臺灣沒能輸出任何茶葉，總計25,000半箱 (half-chests) 的茶葉堆積在大稻埕。⁷⁰由此可見，北臺灣的進出口貿易確實因為法艦封鎖而受到阻礙。法來格在報告中強調，本年度淡

⁶⁶ 黃富三、林滿紅、翁佳音編，《清末臺灣海關歷年資料》，總頁647。

⁶⁷ 黃富三、林滿紅、翁佳音編，《清末臺灣海關歷年資料》，總頁647。

⁶⁸ 陳慈玉，《近代中國茶業的發展與世界市場》（臺北：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1982），頁109-112。

⁶⁹ 黃富三、林滿紅、翁佳音編，《清末臺灣海關歷年資料》，總頁648。

⁷⁰ 黃富三、林滿紅、翁佳音編，《清末臺灣海關歷年資料》，總頁647-648。

水海關的進出口表現如果差強人意，實是非戰之罪。經檢視淡水海關1884年第四季的海關季報（“Tamsui Statistics. October-December Quarter, 1884”），相較前幾年第四季表現，確實一落千丈。⁷¹

在〈1884年淡水海關貿易報告〉中，法來格指出，如果軍事行動擴展至茶葉種植地，將會直接打擊茶葉的產量，並摧毀北臺灣最具利潤的產業，造成無法估計的損失。⁷²尤其基於1883年茶葉市場一片光明，促使1884年洋商投入了更大規模的資本在臺灣茶葉產業中。⁷³這些生產投入如果真如法來格所述，因戰爭而付之一炬，恐怕將會重創北臺灣的對外貿易。至此我們已可推測在封鎖線下即將受到重創的人是誰了，正是如陶德一般的茶商，假使他就是上述報告中那些在茶產業上投入大規模資本的商人，那麼便能理解何以他對封鎖線如此焦慮，並且不斷抱怨英國海軍不願幫忙。

不過陶德的擔憂很快便獲得紓解。正如同本文開頭法來格所述，臺灣在1885年迎來一個始料未及的轉變。雖然法軍在1885年1月時便有撤離臺灣的想法，但一直到同年4月清法雙方和談，4月15日法國政府才發布結束封鎖的命令。⁷⁴該年4月16日，法艦駛離，2日後便有商船來港貿易，自是日起至該年年底，北臺灣貿易迎來前所未有的榮景。這股蓬勃的貿易氣息使茶葉貿易在4月底恢復，淡水的商人不僅忙著將去年堆積在港邊的那批茶葉外銷，還追加賣出了4月初剛採摘的新鮮茶葉。⁷⁵這番氣象與法軍封鎖期間大相徑庭，甚至可以說是因為法軍的封鎖，導致物以稀為貴，反而提升了茶市的買氣，即使是陳放半年的茶葉也能順利外銷。

諷刺的是，封鎖相對鬆散的南臺灣口岸，其貿易表現完全與北臺灣呈現相反的趨勢。從「圖1」可知，1885年的打狗海關稅收

⁷¹ 吳松弟編，《美國哈佛大學圖書館藏未刊中國舊海關史料（1860-1949）》，第53冊，頁376-380。

⁷² 黃富三、林滿紅、翁佳音編，《清末臺灣海關歷年資料》，總頁649。

⁷³ 黃富三、林滿紅、翁佳音編，《清末臺灣海關歷年資料》，總頁648。

⁷⁴ 格勞特著，黎烈文譯，《法軍侵臺始末》，頁52、106。

⁷⁵ 黃富三、林滿紅、翁佳音編，《清末臺灣海關歷年資料》，總頁678-679。

表現幾乎跌到谷底，甚至到了1886年也沒能回復。兩地海關的稅收情形有如此巨大的不同，要歸咎於主要出口商品在國際市場上的供需情況。

南臺灣主要的外銷商品為糖，〈1884年打狗海關貿易報告〉指出該年度打狗海關的出口表現之所以未受到封鎖的影響，源於封鎖時糖季已經結束。根據〈1885年打狗海關貿易報告〉所述，打狗及安平兩口主要的外銷商品為糖及米。⁷⁶紅糖（Brown Sugar）在1885年外對日本及其他國家的外銷量為295,241擔，相較於1883年532,001擔以及1884年628,246擔，可以說下降不少。海關報告將其歸結為封鎖所致，因為封鎖期間糖的外銷仰賴中式帆船，其貿易數額自然不會記錄在海關的統計數據之中。除此之外，1885年3月時，農人擔憂封鎖會持續延續下去，並不看好蔗糖外銷，因此放棄種蔗，改種米及其他作物，待到1886年時可出口的蔗產量便會顯著下降。這也是為何打狗海關報告預期法艦封鎖的影響力會持續到1886年的原因。⁷⁷

然而，南臺灣外銷的衰頹或許不能全部歸因於法艦封鎖。事實上已有研究指出，十九世紀世界糖業競爭日漸激烈，在1880年代，臺灣幾個較重要的外銷國家，都開始自產或者轉向其他市場購買，像是澳洲開始發展糖業後，不僅不再向臺灣進口糖，甚至成為臺灣糖的競爭對手。其中，臺灣糖外銷的主要對象日本，在清法戰爭期間因為封鎖無法取得臺灣糖，開始尋求其他替代品。日本人原先多半購買紅糖，在此時逐漸改為消費白糖，然而臺灣主要生產的是紅糖而非白糖，因此解除封鎖後，臺灣紅糖不僅競爭對手增加，還要面臨消費者偏好改變，在生產技術沒有明顯改良的情況下，實難維持競爭力。⁷⁸因此整體來說，法艦的封鎖看似

⁷⁶ 黃富三、林滿紅、翁佳音編，《清末臺灣海關歷年資料》，總頁661-664、694-697。

⁷⁷ 黃富三、林滿紅、翁佳音編，《清末臺灣海關歷年資料》，總頁694-697。

⁷⁸ 高淑媛，〈洋人生產機械化與臺灣糖業——以橫濱的打狗糖為例（1870-1895年）〉，《高雄文獻》，4：3（高雄，2014.12），頁6-25；林滿紅，《茶、糖、樟腦業與臺灣之社會經濟變遷（1860-1895）》（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7），頁23-33。

對南臺灣的糖產業造成打擊，但實際上該產業本身的發展以及國際市場的變化才是導致清代臺灣糖業下滑的主要因素。

以上都是出口的情形，接下來談論進口的情況。淡水海關報告和打狗海關報告有著很大的不同。首先，先談論淡水的進口狀況。儘管茶價起起伏伏，但或許正因茶葉貿易帶動了整個臺灣經濟，使得臺灣人民開始有餘力購入一些外國民生用品，進而引起法來格的注意，並特別記錄在 1884 年及 1885 年的海關報告中。在法艦解除封鎖後，彷彿是為了彌補過去半年來無法正常貿易，大量商品伴隨活絡的對外貿易流入北臺灣。這種大量進口貿易的情形過去未見，因此法來格在報告中特別描述這現象。

在飲食方面，美國「老鷹牌（Eagle Brand）」保久乳（preserved milk）便是一項重要的外國進口日用品。這項商品開始在一些本地人的雜貨店（household store）販售，臺灣本地人會將保久乳與茶一起食用，在晚上就寢前透過這種方式攝取一些營養。⁷⁹其他商品舉凡烏賊（cuttle-fish）、麵粉、蝦米（dried prawns）不僅進口量上升，且都維持穩定的價格。日常用品像是火柴、煤油、雨傘也有相當大的需求量。其他的奢侈品也受到特定客群的歡迎，香檳和利口酒深受官員喜愛，而保久乳、餅乾（fancy biscuits）及香皂（scented soap）的主要客群為有錢的本地人。⁸⁰

這些品項的進口，不僅顯示臺灣人的消費能力逐漸提升，並且願意嘗試新事物。部分臺灣人甚至已經不再只是求溫飽，開始轉而追求昂貴的舶來品。清法戰爭促使臺灣本地人更為頻繁的接觸外國商品，例如戰爭期間因封鎖線的影響，在臺外國人不易取得補給品，本地人反而能靠著走私的方式取得這些外國生活用品，並轉賣給像陶德這樣的在臺外國商人。

就南臺灣而言，海關記錄在案的主要的進口品項一直都是鴉片。1884 年及 1885 年的打狗海關報告亦不例外，對於進口商品的

⁷⁹ 黃富三、林滿紅、翁佳音編，《清末臺灣海關歷年資料》，總頁 647、679。

⁸⁰ 黃富三、林滿紅、翁佳音編，《清末臺灣海關歷年資料》，總頁 679。

描述仍舊集中在鴉片上。因封鎖之故，鴉片每箱的價格一度飆升至千元以上（正常價格約落在每箱 600-800 元之間），封鎖期間的進口量相較其他月份，大幅跌落。⁸¹鴉片雖非生活必需品，但已是眾人上癮的生活嗜好品，短時間還是受到影響。

由上述種種來看，儘管清法戰爭確實對北臺灣造成了傷害，但是戰爭結束後，北臺灣經濟復甦得相當快速，以至於海關稅收看起來反而增加了。清法戰爭或許暫時阻斷了北臺灣的對外貿易，但無法削減北臺灣的貿易量。另一方面，雖然南臺灣也受到清法戰爭的衝擊，並且有關稅稅額下滑、甚至比北臺灣嚴峻的現象；但實際上南臺灣所受的封鎖壓力較小，真正造成南臺灣外銷下滑的原因應該是產業技術的失色與國際市場的變化。

五、結語

一般人聽到 1884 年這場發生於北臺灣的戰爭時，率先浮現腦海的畫面往往是戰爭帶來的各種破壞，然而現實並非如此，在戰爭前後，臺灣已進入了一個空前的貿易繁榮期，戰爭並非改變臺灣貿易趨勢的主因。1860 年代，臺灣進入了開港通商的時代，臺灣與西洋世界的交流更加頻繁。清法戰爭爆發時，已經距離開港通商二十幾年，洋商在臺灣的貿易不僅蓬勃發展，甚至發展出了屬於自己的茶葉產業鏈。通商口岸成為臺灣通往世界商貿的出入口，淡水海關作為洋商貿易的管理者，見證了臺灣與世界商貿加速聯繫的過程。

清法戰爭對臺灣的影響，從「圖 1」來看，或許並不像陶德形容的那樣嚴重，本文重新檢視相關史實，指出法艦封鎖對臺灣的影響並不如我們過去所想的那麼大。但這也須說明「影響不大」的看法其實也是種後見之明。對身處其中的法來格等在臺外國人來說，在戰爭當下，他們未能得知何時封鎖可以結束，總是擔憂著長時間的封鎖將不利於臺灣的茶葉貿易。這或許正是為何陶德在臺灣明明還能準備聖誕節大餐，但仍三番兩次地強調外國商人

⁸¹ 黃富三、林滿紅、翁佳音編，《清末臺灣海關歷年資料》，總頁 662。

在臺灣的境遇有多麼悲慘，且一再呼籲英國應加派軍艦來保護他們。因為在陶德心中，問題不在於自己的生活，而是在於洋行的事業，唯有英國介入，臺灣的封鎖才能儘早結束，趕上即將到來的茶季。畢竟根據他自己的說法，繼續封鎖下去將使在臺外國人（幾乎全是英國人）的生意停擺，損失難以估計。⁸²

意外的是，這場從1884年10月中起算，到1885年4月中的封鎖也不過6個月，恰好趕在春茶茶季出口前夕便解封。由於封鎖導致臺灣茶葉缺貨，因此當貿易一恢復，紐約的市場便迫不及待的想要進口臺灣茶；與此同時，封鎖期間滯留港邊的陳年茶葉也銷售一空。因此反倒將淡水海關1885年的關稅收入推向高峰，可以說封鎖的「恰到好處」，同時也挽救了陶德的事業。不過反觀未受到嚴格封鎖的打狗海關，反而大受打擊；至1886年，其海關稅收都未能恢復先前水準。

除了陶德的部分，法軍的紀錄讓我們看到清法戰爭截然不同的一面。儘管淡水及基隆都曾有過軍事行動，並且對這兩個口岸都造成一定程度的破壞，但法軍的損失慘重、封鎖線的無效以及對戰事不甚樂觀的態度，是我們在陶德、淡水海關或者清朝的紀錄中較少見到的。就連低階的法軍Jean L.都明白，對臺灣的封鎖行動就是一場笑話。臺灣綿長的海岸是導致法軍無法有力執行封鎖的關鍵，在船艦不足的情況下，法軍難以維持長期且有效的封鎖。也因此才能從各方紀錄中看到各種穿越封鎖線的辦法，小至走私日用品或信件，大至運送軍需品與部隊。

最後回到本文一開始的出發點，也就是淡水海關的紀錄，由於該機構的主要職責在管理北臺灣條約口岸的對外貿易，因此報告本身的重點仍多放在貿易情形，談論清法戰爭時亦是站在戰火是否影響口岸貿易的角度。但從這些數據與進出口的文字紀錄中，正好可以窺見臺灣貿易活動生機蓬勃的模樣。在此之前，淡水海關報告對於進出口商品的描述多半放在北臺灣的重點產業，

⁸² John Dodd, *Journal of a blockaded resident in North Formosa during the Franco-Chinese War, 1884-5*, p. 64.

如茶葉，但是在1884年及1885年的報告都曾清楚的指出進口外國日常用品數額增加的情形，而這種增加源自於本地人對外國用品的需求量上升。雖然我們無法將此情形溯及臺灣全部人的消費行為，但至少我們能夠推測，部分臺灣人的消費力提升，頗能接受外國商品，可能是因為在清法戰爭時有機會協助走私外國用品，接觸到更多舶來品，有些商品甚至得以鋪貨於本地商店中，成為部分本地人的日常所需。除此之外，無論是淡水海關貿易數額的上升，或者打狗海關貿易數額的下降，從前面的討論中亦能觀察到，清法戰爭或許有短暫阻礙的效果，但主因仍是受到大環境的影響，並不是法軍封鎖效力的強弱所致。

本文利用不同群體對清法戰爭的紀錄，重新討論法艦封鎖對臺灣的效力，以及該場戰爭對臺灣商貿活動的意義，除了對這場戰爭在臺灣的情形有更為全面的了解外，亦能由此推論，清法戰爭對臺灣的貿易活動而言，各方之詮釋與解讀必須在相互比較下才能產生意義。

（責任編輯：江趙展 校對：韋彥廷）

引用書目

一、文獻史料

- 清·劉銘傳撰，馬昌華、翁飛點校，《劉銘傳文集》，合肥：黃山書社，1997。
- 何內·科邦（René Coppin）著，季茉莉（Julie Couderc）譯注，《北圻回憶錄：清法戰爭與福爾摩沙，1884-1885》，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2013。
- 吳松弟編，《美國哈佛大學圖書館藏未刊中國舊海關史料（1860-1949）》，第 1、53、232、250 冊，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
- 約翰·陶德（John Dodd）著，陳政三譯，《泡茶走西仔反：清法戰爭臺灣外記》，臺北：臺灣書房，2007。
- 格勞特（Eugène Garnot）著，黎烈文譯，《法軍侵臺始末》，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
- 海關總署《中外舊約章大全》編纂委員會編，《中外舊約章大全》，北京：中國海關出版社，2004。
- 陳霞飛編，《中國海關密檔：赫德、金登幹函電匯編（1874-1907）》，卷 2，北京：中華書局，1990。
- 陶德（John Dodd）原著，陳政三譯述，《北臺封鎖記：茶商陶德筆下的清法戰爭》，臺北：原民文化，2002。
- 黃富三、林滿紅、翁佳音編，《清末臺灣海關歷年資料》，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1997。
- Jean L. 著，鄭順德譯，《孤拔元帥的小水手》，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2004。
-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 China*. Shannon, Ireland: Irish University Press, 1971.
- Dodd, John. *Journal of a blockaded resident in North Formosa during the Franco-Chinese War, 1884-5*. Hong Kong: Daily Press, 1888.

Garnot, Eugène. *L'expédition française de Formose, 1884-1885*. Paris: Librairie Ch. Delagrave, 1894.

Hong Kong Daily Press, Hong Kong, 1884, 1885.

The Hong Kong Weekly Press, Hong Kong, 1907.

The North China Herald, Shanghai, 1907.

二、近人專書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譯室編，《近代來華外國人名辭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

李愛麗，《晚清美籍稅務司研究——以粵海關為中心》，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

杜蘅之，《國際法大綱》，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1。

林滿紅，《茶、糖、樟腦業與臺灣之社會經濟變遷（1860-1895）》，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7。

柏麗梅主編，《清法戰爭滬尾之役135周年國際研討會論文集》，新北：新北市立淡水古蹟博物館，2019。

淡江大學歷史學系編，《第三屆淡水學暨清法戰爭120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淡江大學歷史學系，2004。

陳治世，《國際法》，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5。

陳詩啟，《中國近代海關史（晚清部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陳慈玉，《近代中國茶業的發展與世界市場》，臺北：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1982。

廖文卿主編，《清法戰爭滬尾戰役130周年研討會成果集》，新北：新北市立淡水古蹟博物館，2014。

Alsford, Niki J. P. *The Witnessed Account of British Resident John Dodd at Tamsui*. Taipei: SMC Publishing Inc., 2010.

三、近人論文

白詩薇（Sylvie Pasquet），〈從法國史料來看清法戰爭在淡水（一八八四年）〉，收入淡江大學歷史學系主編，《二〇〇一年淡水學學術研討會——歷史、生態、人文論文集》，臺北：國史館，2003，頁7-21。

紀榮松，〈參與清法戰爭的法國巡洋艦、砲艦和杆雷艇〉，《淡江史學》，22，臺北，2010.9，頁147-188。

高淑媛，〈洋人生產機械化與臺灣糖業——以橫濱的打狗糖為例（1870-1895年）〉，《高雄文獻》，4：3，高雄，2014.12，頁6-25。

黃頌文，〈清季臺灣貿易與寶順洋行的崛起（1867-1870）〉，《臺灣文獻》，61：3，南投，2010.9，頁107-149。

楊玉菁，〈清法戰爭時期歐洲人眼中的北臺灣——以《北臺封鎖記》與《孤拔元帥的小水手》為例〉，《文史台灣學報》，1，臺北，2009.11，頁276-302。

Alsford, Niki J. P. "A Barbarian's House by the River Tamsui: One House and the History of Its Many Occupants." *Journal of Family History*, 40: 2 (April, 2015), pp. 153-171.

Chan, Kai Yiu (陳計堯).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to the Periodical Publications of the Maritime Customs in Southern Taiwan, 1863-95." *Asian Research Trends New Series*, 13 (2018), pp. 51-70.

四、網路資料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人名權威檢索系統》。<http://archdtsu.mh.sinica.edu.tw/imhkmc/imhkm?0005E647002A030100000000000A00A00000003E0000000000^1> (2020/10/27)。

Formosa Nineteenth Century Images. <https://rdc.reed.edu/c/Formosa/home/> (2022/8/22).

Hong Kong Public Libraries' Collection of Old HK Newspapers. <https://mmis.hkpl.gov.hk/old-hk-collection> (2022/ 4/ 16).

ProQuest Historical Newspapers: Chinese Newspapers Collection. <https://www.proquest.com/hnpchinese/collection/advanced> (2022/4/16).

Trade Under Blockade: The Influence of the Sino-French War (1884-1885) on Taiwan

Pao-wen Huang*

Abstract

During the Sino-French War of 1884-1885, the French imposed a trade blockade on goods to and from Taiwan. The British tea merchant John Dodd (1838-1907) would later write of his impressions of these events in his *Journal of a Blockaded Resident in North Formosa* during the Franco-Chinese War, 1884-1885. According to Dodd, the blockade had a devastating impact on the local economy. The present paper argues, however, that such a view is, in fact, highly misleading; for contemporary trade reports and statistical records of the Tamsui customs office show that export and import duties increased rather than decreased between 1883-1885. Indeed, collections of export and import duties reached peak levels in 1885. In addition to showing that our general impression of the Sino-French War is mistaken, this paper also examines why such a disparity exists between our perception of the war and the reality of what actually happened.

Keywords: Sino-French War, Tamsui, John Dodd, blockade, customs duties

* Ph.D. student,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